

# 庙底沟文化与璧的起源\*

王炜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关键词: 庙底沟文化, 璧, 琮, 起源

摘要: 本文结合史籍中关于璧的记载及目前对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玉璧的相关认识,对璧等器物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并根据近年来高陵杨官寨、扶风案板、华县泉护村等遗址发现的璧、琮类器物以及彩陶图案中的相关题材,认为璧等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的礼器在中原地区可能为本土起源,它们发生的时代也许可以追溯到庙底沟文化时期。

KEY WORDS: Miaodigou Culture, Bi jade, Cong jade, Origins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cords concerning bi jade in transmitted texts and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Liangzhu culture and the Hongshan culture in order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concept and origin of this type of jade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recent discoveries of bi jade, cong jade, and similar iconographies in color-painted ceramics from the Yangguanzhai site in Gaoling, the Anban site in Fufeng, and the Quanhucun site in Huaxia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bi jade as ritual paraphernalia might have been developed first in the Central Plains areas during the Miaodigou period.

璧是古代玉器中跨越时空最大和影响力最强的一种礼器,中国古籍中对璧这种器物多有提及。“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尔雅·释器》这段文字是研究者在讨论璧时引用最多的文献,大家常常将一种体扁平,外周圆形,中央有一圆孔,且孔径小于肉宽,即“肉倍好”的玉石器物称作璧<sup>[1]</sup>。另外,在考察璧这类器物时,除了依据“好”与“肉”的比值外,器物的大小也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条件。许慎《说文解字》载“珮,石之次玉者,以为系璧。”段玉裁注曰“系璧,盖为小璧,系带间,悬左右佩物也。”

那么,多大规格的璧才可谓标准型的璧,什么样的璧被称做系璧?先有小型璧还是先有大型璧,它们的关系如何?璧这种器物究竟是何时被人们接受并且赋予其神圣使命等等这些关于璧的具体问题,古代文献似乎语焉不详。

就考古发现的玉璧而言,其在古代中国的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参照文献记载及相关发现,杨晶将外径在5厘米以下,且不能佩戴在手臂上的扁平体圆环形玉器称为系璧<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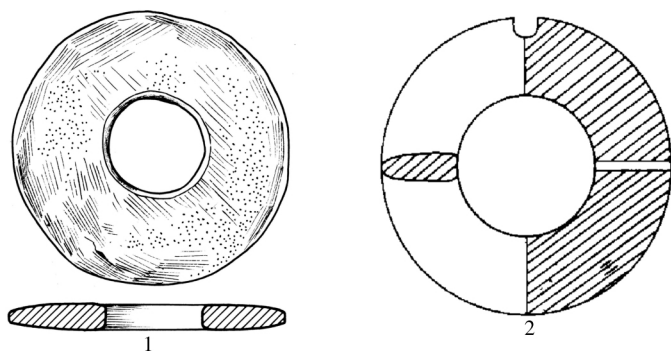
也有研究者将这种器形较小的璧称作小型璧,将它的标准定在10厘米以下<sup>[3]</sup>。

有研究显示,小型璧出现的年代总体上可能要早于大型璧,但它们之间又不仅仅是一种先后关系。中国古代玉璧的两个最重要分布区东北与环太湖地区的考古发现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在东北地区,红山文化之前就已经发现了小型玉璧,其后,小型玉璧被红山文化所沿用,并且还和红山文化的大型玉璧一起形成组璧,出现在红山文化的墓葬中。而环太湖地区,小型玉璧常常发现于崧泽文化及良渚文化的早期,到良渚文化中晚期时,小型玉璧已经基本消失,流行的主要是直径在15~20厘米以上的大型玉璧。

从考古发现看,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璧均由本地起源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它们还分别向南及向北影响了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中出现的的小型玉璧就可能同时受到了来自北方红山文化和南方良渚文化同类器物的影响<sup>[4]</sup>。

仰韶时代的中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渭河流域为中心发展

\* 本文得到“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区域聚落与居民研究”项目(编号:2013BAK08B05)的资助。



图一 庙底沟文化璧类器物

1、2. 石璧(杨官寨遗址 H333:4、案板遗址 H4:76)

起来的庙底沟文化,将其最具特征的彩陶发展到了极致,其影响范围东到大海、西至甘青、北达河套、南越长江,并且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整合。但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在这种考古学文化中似乎并没有发现多少和玉璧相关的线索,在人们的印象中,庙底沟文化的先民好像还不知道璧为何物。人们甚至以为,后来分布于该区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所崇尚的琮璧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承自良渚人的传统,而与其之前的庙底沟文化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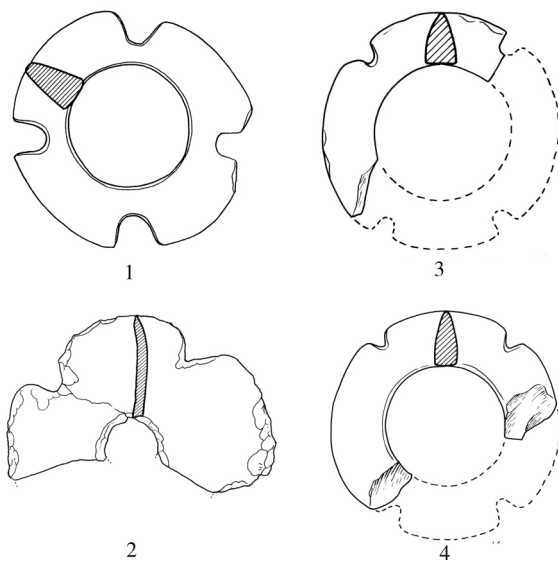
这种观点好像已经被该区域龙山时代的一些考古发现所印证。例如,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区,不仅在芮城清凉寺玉器上发现了良渚的风格<sup>[5]</sup>,山西陶寺遗址中出土的玉琮上,有横的分节以及四面的竖槽,也被认为是良渚文化玉琮传播演化的产物<sup>[6]</sup>。在陕北地区,延安的芦山峁<sup>[7]</sup>、神木的石峁<sup>[8]</sup>等遗址,出土和采集的良渚式玉琮、玉璧等显然也与良渚文化同类器关系密切,尤其是玉琮,不仅四面有竖槽和分节,而且还刻画出与良渚文化玉琮一致或相似的神徽,这种器物很可能是直接吸纳或借鉴了良渚文化的产品。更遥远的例证来自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其大型玉璧和外方内圆的玉琮,明显也有良渚文化的影子。如此等等。

良渚文化发达的玉琮璧与仰韶时代不见玉琮璧,甚至很少使用玉器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在探寻中原等地区玉璧的来源时,自然就联想到了以玉器著称的良渚文化。

中原文化系统中果真没有使用璧的传统吗?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实际上早已引起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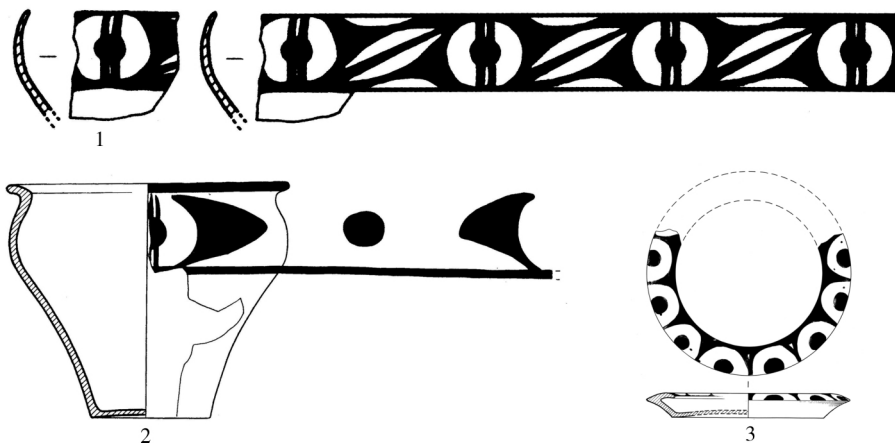
关注。

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王仁湘。他曾经根据山西芮城清凉寺庙底沟二期墓地中发现的璧和琮,对中原没有琮璧的传统提出过质疑,并且推测中原地区璧的源头或许在庙底沟文化中可以找到线索<sup>[9]</sup>。他仅仅只是对以往公布的庙底沟文化相关考古资料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梳理,就发现了一些与璧相关的重要线索。如扶风案板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石璧<sup>[10]</sup>。案板这种石璧(图一 2),器边上常开有凹口,规格一般是内径 5~6、外径 10 多厘米,不论是从器形上观察,还是从规格上考量,都与我们心里想象的璧很接近了,只是它们尚不是玉璧而已。事实上,泉护村遗址过去发现的所谓陶环也与这种璧关系密切。如泉护村庙底沟文化第二期 H87 中就出土过两件器外侧边有 4 个凹口的陶环,其中的 H87:76 为泥质红陶,器物剖面近等腰三角形,素面,内径 4.8、外径 9.6、厚 1.5 厘米(图二 1)。同期的 H86:31,我们在报告中称其为环状圆陶片,器已残,泥质灰陶,周边也可能有 4 个凹口,直径 13.1 厘米(图二 2)<sup>[11]</sup>。在杨官寨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器物,不仅有陶质的,而且还有石质的。如杨官寨庙底沟文化聚落环壕的西门址 H776 就出土了不少这种环(图二 3、4)。这种器



图二 庙底沟文化陶璧(环)类器物

1、2、3、4. 陶环(泉护村 97H87:76、97H87:31、杨官寨 H776:75、H776⑤:39)



图三 庙底沟文化壁纹彩陶

1. 彩陶钵(西阴村 H27:3) 2. 彩陶盆(泉护村 H22①:79) 3. 彩陶盘(杨官寨 H43:1)

物应该与扶风案板遗址庙底沟时期的石璧具有类似的功能<sup>[12]</sup>。

如果说上述这种器物还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璧,那么发现于杨官寨遗址南区的编号为 H333 的灰坑中出土的一件石璧,则是一件地地道道的标准型璧。这件石璧为大理石打磨而成,器表平整,器周边不很规则,肉的剖面不再呈梯形,璧外径 16.9 厘米,好为管钻而成,径 5.5~5.9 厘米,肉宽 5.5、厚 0.6~1 厘米(图一,1)。其好与肉的比例完全符合杨晶提出的关于璧的一些标准。灰坑中同时出土了大量陶片,可辨器形有罐、钵、盆、小口瓶等,根据出土物判断该灰坑年代当为庙底沟文化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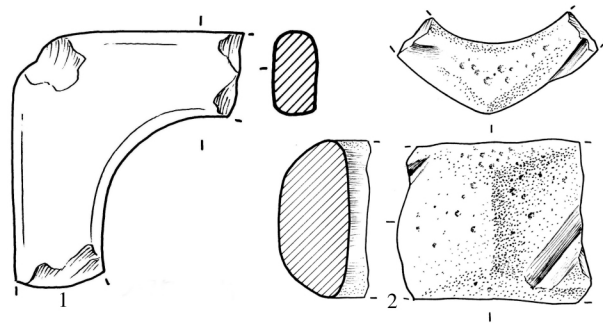
庙底沟文化先民不仅大量使用陶石璧,他们还将璧以图案的形式定格在了彩陶器上。

从彩陶图案中释读出有璧形图案的第一人也是王仁湘。他在观摩 1997 年泉护村遗址考古标本时,在一件残彩陶盆上发现了他认为“璧”的残图案。这件彩陶盆系泥质红陶,口径 24.4、高 20 厘米(图三,2)。彩陶的图案仅残留约二分之一,器物的唇面上施有一周黑彩,上腹部外侧用黑彩绘有由圆点、双平行竖线条纹加圆点、燕尾状纹等组成的图案,下腹以条带纹绕器一周。这件标本所在的单位 H22 是泉护村庙底沟文化的第三期,同出的器物全部为庙底沟文化典型器物,所以这件彩陶的年代也无疑属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实际上,这种彩陶图案早在 1994 年对山西夏县西阴遗址的第二次发掘中就发现

过<sup>[13]</sup>。那是一件已然残破的典型庙底沟文化陶钵,在它的上腹外侧位置,残存有一组图案,是由圆圈与圆点构成的纹样,其旁是斜向的叶片纹。这种纹饰以地纹观之,似乎正是璧的图像,其中间的圆点表现的应该是璧的好,两条竖带表现的正是系在璧上的绳索一类东西(图三,1)。

需要说明的是,在泉护村 H22 灰坑中还出土有一件与璧相关的残破陶环,如上所述,这种陶环在泉护村遗址并不鲜见,但它与带有“悬壁纹”的彩陶共存却是意义非凡。它们和扶风案板遗址那种石璧的形制很接近,外侧也有凹口,是否也应该将其归入“悬壁”或“系璧”一类器物,值得以后研究关注。

如果按王仁湘的说法,西阴遗址和泉护村遗址发现的这类“悬壁纹”彩陶,表现的是类似后来诸如汉代画像石上的那种悬壁之瑞象。那么,杨官寨遗址发现的表现璧的彩陶则向人们提供了另一种想象空间。这是一件彩陶盘,出土于杨官寨庙底沟文化环壕聚落东北部的灰坑 H43 内,灰坑的平面呈椭圆形,底部略小,在其堆积中出土的陶器大部分为残片,可辨器形有盆、钵、罐、瓶等,均为典型的庙底沟文化遗存。这件编号为 H43:1 的彩陶盘为泥质黄褐陶,器敛口,宽弧沿,浅腹,平底,器物内壁有明显修整痕迹并施



图四 早期石琮对比图

1. 石琮(杨官寨遗址 H776:225) 2. 玉琮(陶寺遗址 M22:129)

白色陶衣,外壁亦有刮修痕迹。器腹素面,沿面为白衣黑彩纹饰,残存八组弧线三角与半圆组成的图案。外口径 19.5、内口径 14、底径 13.5、高仅仅 2.8 厘米(图三,3)。从该器物仅仅 2.8 厘米的高度看,要想全解其彩陶图案,理想的视角是俯视或者将器物像挂盘一样固定在墙体上的平视,以这样的视角并从底纹观察,这些图案就如同一个个玉璧,按照其纹饰的分布规律计算,原先绘在该器物沿面上的这种玉璧纹应为十二组。十二是个值得关注的数字。

彩陶中以璧为题材的图案是过去从未见过的画面,也是研究者还未及解读的画面,它们是否与庙底沟文化的陶、石璧发挥着同样的作用我们还不得而知。

有研究显示,琮与璧的出现与环镯类饰品有关,良渚文化中似乎可以寻到环与璧之间的演变线索,庙底沟文化也有使用镯类饰品的传统,虽然发现多为陶环之类,但同时期也发现过大量的石环。由此可见,庙底沟文化同良渚文化一样,也有由环镯制成璧类器的基本条件,上述石璧的发现也许就是个例证。

至于仰韶时代为什么没有出土玉璧。个人认为,这一方面可能是考古工作的局限性,截止目前,典型庙底沟文化的大型墓葬毕竟还没有发现,而其它地区有关玉璧琮一类器物大部分是发现于大型墓葬内的。另一方面,有可能与仰韶时代的传统有关。庙底沟文化之前的半坡文化等就很少使用玉器,南郑龙岗寺<sup>[14]</sup>半坡文化早期墓葬当中发现的玉斧、铲、镑、凿和镞等,西乡何家湾遗址<sup>[15]</sup>出土的碧绿色硬玉斧、镑等,都是工具一类。铜川瓦窑沟<sup>[16]</sup>除发现工具类的玉斧(钺)外,还在一个厚葬的小孩墓葬中发现一件非常精美的玉坠。可见,至少在半坡文化时期,玉器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礼器。到了仰韶中期的庙底沟文化时期,玉斧(钺)等工具类玉器还偶然见到,如杨官寨发现的玉铲(钺)等。这时候尽管已经出现玉环和石璜之类的前所未见的饰品,河南临汝中山寨就出土过一件石璜和玉环<sup>[17]</sup>,但直至相当于庙底沟文化晚期或者仰韶晚期的半坡四期文化阶段,中原地区如灵宝西坡<sup>[18]</sup>这样的高等级墓葬,随葬的玉器仍然以工具类为主。当然这个时期的一些遗址中,已经见

到了可能具有礼仪性质的玉器,如河南郑州大河村四期发现了椭圆形玉饰、玉环和玉璜,还有一件玉刀等<sup>[18]</sup>。

庙底沟文化时期尽管还不见玉璧,但通过上面的分析,至少可以确认,在这个时期,人们对璧的概念已经逐渐形成,只是它延续了半坡文化内敛的性格,以陶石一类朴实质地的璧甚至彩陶表达着与玉璧同样的思想。齐家文化常见石璧,也许正是这种风格在西部地区的延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杨官寨遗址不仅发现了庙底沟文化的石璧,还发现了可能与琮相关的器物。在遗址环壕聚落的西门址两侧壕沟内发现两件石琮。其中一件编号为 G8-2①:19,器形整体磨制规整,残存一角,截面近梯形,一侧面上有斜向磨制凹槽。外轮廓近方,内圆,一边长 3.3、另一边长 4.4、厚 5.2 厘米。另一件编号 H776:225(图四,1),表面打磨光滑,截面呈扁长方形。外方内圆,折角处残损。一边长 5.3、另一边长 4.9、厚 1 厘米。这种器物与陶寺 2002HM22:129 的无射素面玉琮(图四,2)非常相像<sup>[19]</sup>,仅器物的规格略有差别,在杨官寨遗址还发现了形制上与陶寺 M1267:2 的圆形刻纹玉琮接近的石器<sup>[20]</sup>。由此可见,在庙底沟时期琮的概念似乎也已经产生。

过去的研究显示,呈内圆外方体的真正意义上玉琮的出现可能已经到了良渚文化的晚期,玉璧琮一起使用也可能在良渚文化晚期才开始<sup>[21]</sup>。杨官寨石璧琮的确认,打破了学界以前有关中原地区璧琮可能来自良渚的结论,最起码,璧琮这种传统应该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已经存在。

庙底沟人为什么要将璧纹绘在彩陶上?他们要向当时的社会传导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这些都是我们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大家所熟悉的庙底沟文化彩陶图案是经过长时间的凝炼发展而最后成为定式的,这种图案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多次重复出现,受到广泛认同,它肯定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装饰器物,严文明认为,鸟纹代表的是生生不息的太阳<sup>[22]</sup>等等。如果我们说彩陶的流行是代表着“图腾崇拜”的大同时代,那么,作为真正意义上礼器的玉璧、玉琮的流行,是否意味着“绝地天通”新时代的开始呢?

中国考古学以陶器为基础建立的文化谱系

所反映的各自有序的格局,与以玉璧琮分布所反映的“大一统”现象是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色。玉璧琮或徘徊于黄河沿岸,或游弋于长江之滨,作为古代文化的一种联系方式,在多元一体模式的形成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玉璧琮的传播与扩散也许正是多元到一体格局形成的一个基础。玉璧琮这种概念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它与古代中国以农耕生产方式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和由此同时成长起来的祭天礼地的精神生活以及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关系密切<sup>[23]</sup>。渭河腹地的关中是中国第一个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区,非常适合农业文明的发展,半坡先民经过上千年的经营,为这一个小区积累了足够的资源,使其有余力维持人群中一些俊杰之士,专注于劳心的工作,在此基础上进行某些抽象思考与创作,并将这些成果保存传输于后人<sup>[24]</sup>。这种社会性的精神生活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灵魂<sup>[25]</sup>,由它所构成的思想宝库到庙底沟时代被发展到极致,庙底沟先民不仅以最具特色的彩陶完成了中国的第一次文化整合,它所创建的璧琮礼制,还为中国社会进入更高等级的文明奠定了基础。

- [1]周南泉.论中国古代的玉璧——古玉研究之二[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1).
- [2]杨晶.中国史前玉器的考古学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 [3]郑建明,马翠兰.史前小型玉璧研究[J].北方文物,2008(3).
- [4]同[3].
- [5]a.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局,芮城县文物局.山西芮城清凉寺新时期时代墓地[J].文物,2006(3). b.马金花.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出土玉器浅说[J].文物世界,2009(3).
-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0(1).

- [7]姬乃军.延安市发现的古代玉器[J].文物,1984(2).
- [8]王炜林,孙周勇.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11(4).
- [9]王仁湘.琮璧名实臆测[J].文物,2006(8).
- [10]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扶风案板遗址(下河区)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3(5).
- [1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华县泉护村——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 [1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高陵杨官寨——环壕聚落西门址考古发掘报告[M].待出版.
- [1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学会.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C]//三晋考古(第二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 [1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1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安康水电站库区考古队.陕南考古报告集[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 [1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铜川瓦窑沟遗址考古发掘报告[M].待出版.
-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中山寨遗址[J].考古学报,1991(1).
-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18]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J].考古,2003(9).
- [20]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西[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 [21]刘斌,王炜林.从玉器的角度观察文化与历史的嬗变[C]//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六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 [22]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J].文物,1978(10).
- [23]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 [24]许倬云.历史大脉络[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25]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张鹏程)